

學人風采

歷史長河經眼底， 霸業興廢上筆端

——記我所認識的許公倬雲

● 陳方正

神州風雲變色，新中國成立，那已經是七十年前事，它促成了許多學子遠渡重洋，在新大陸立足揚名，成為學界顯赫人物。其中四位歷史學家我有幸相識，他們的經歷、成就大體相若，性情、稟賦、懷抱卻迥然而異。我和他們專業不同，天各一方，卻有幸逐漸相熟乃至成為朋友，也算是緣分不淺了。

我最早碰到的是張光直兄，那是1958或者1959年在麻省劍橋一個中國同學的聚會上，他黝黑矮小的個子、堅實簡潔而又自信的語調，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但當時我對考古學一無所知，他對物理學興趣也不大，所以話頭不多。過了一兩年，通過羅球慶兄介紹，我得以不時去余英時兄家裏參加他們新亞書院校友的聚會，從而和他認識，更由於曾經在香港出版的《自由學人》上接觸過一些西方史學掌故和理論，所以能夠談得起來。至於彼此相熟，則是十多年後他到香港中文大學來當新亞院長，我們一起參加負責大學體制改革的「工作小組」所帶來的機緣了。何公炳棣輩分甚高，我知道他是從拜讀其大著《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開始，而得以相識，則是因為90年代初和金耀基兄等幾位同事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之故。其時，何公從實證史學轉向思想史領域，其開端便是在我們這份刊物上發表一篇「檢討」杜維明對「克己復禮」所作詮釋的文章(1991年12月號)，由是引起了他和新儒家學者相當激烈的筆戰。此後他經常來港，時相過從，遂有不少機會聆聽他的高論與往事，乃至得以見到他自傳的稿本。

至於認識許公倬雲，也和《二十一世紀》分不開：他不但從頭就參加了我們的編輯委員會，而且創刊號的「展望二十一世紀」欄目就是以他的大作〈理想幻滅，歷史不會終結〉開篇。此短文發表於1990年10月，卻像是已經預見僅僅一年之後的蘇聯解體和接踵而來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驚人之作《歷史

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而率先作出事後證明更為確切的不同判斷，即使純屬巧合，其眼光之犀利也真是令人驚訝！時光荏苒，三十年轉眼過去，面對今日世界亂局，特別是熾烈的俄烏戰爭與日益緊張的中美對峙，我們自不期然又會想起許公十年前出版的《許倬雲說歷史：大國霸業的興廢》來。這題目並不新鮮，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遠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預言西方的沒落，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霸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也是三十多年前事了。許公此書其實是一本談話錄，以論列中國歷代興衰及其近代應付鉅變的得失為主，涉及西方歷史進程乃至中國在本世紀之崛起者，大約只佔四分之一篇幅而已。但無論如何，能夠在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Donald J. Trump)橫空出世之前四年，就再度拈出這個題目來，那也真和世界大勢的演變若合符節，使讀者眼前為之一亮。

上面這四位史學家的人生途徑大體上是平行發展的：即在中國大陸或港台成長，大學或研究院畢業後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然後在彼邦勤懇治學，嶄露頭角，卓然成家。由於早年經歷以及史學的陶冶，他們都懷有相當強烈的家國情懷——雖然其政治取向並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眾所周知，英時兄傾心自由民主傳統，經常評騭時事，褒貶人物不稍假借，他在《二十一世紀》總第二期(1990年12月號)發表〈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短文，斷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大可能有光輝前景」，這個看法在其後三十年間也始終未嘗改變。何公和光直兄則不然，他們雖然不常發表政治議論，但一直看好也認同新中國，經常回到大陸參觀、考察、演講，這是大家熟知的。至於許公，則態度可形容為保持善意的中立和力求客觀：《霸業興廢》書末以「飛龍在天」、「亢龍有悔」和「群龍無首」來形容中國所面臨的處境和選擇，那正是這種態度的最佳寫照。

但無論其政治傾向如何，在這四位知名中國史學家之中，有興致與精力走到歷史專業領域之外，去認真探討、分析、評論人類歷史整體與世界大勢，進而著書立說的，卻僅得許公一人而已，其故安在，頗為值得思考。當然，像所有關乎人生選擇的問題一樣，這歸根究底，最後總不免牽涉個人性情、氣質與稟賦。但除此之外，無疑也和個人成長環境、際遇、機緣有相當重要關係。從這個方向想，我們會發現，許公與以上三位並世史學家的確有兩個大分別。

首先，在表面上看，許公和他們一樣，都是生於憂患，成長於流離動亂，經歷了抗戰、內戰、逃難、漂洋過海和一番奮鬥，才得以在一個嶄新國度立足。但稍為細究就會發現，其實大不然。當然，在抗戰期間許公所受的顛沛流離和驚恐危險，所目擊的凄慘痛苦情狀，比之定居於北京、昆明或者安徽鄉間的其他三位要多得多。這是因為他父親是負責供應軍糧民食的官員，必須在戰火四起的前線附近工作，而他自身罹天生殘缺之苦，不能夠遠離父

母。但抗戰勝利之後那幾年，他回到老家無錫居住，已經開始體會到傳統士大夫家族的滋潤和味道，而自此之後，比起那三位儕輩來，他的人生更是穩定、暢順和幸運得多了。

大陸易手之際他渡海赴台，甫入台灣大學便以文史考卷一鳴驚人，得到系主任、院長乃至校長的賞識，自此一帆風順，畢業後入研究院，再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儼然成為當時雲集南港眾多古史、甲骨、考古專家所着意培養的接班人，所以物質環境雖然艱苦，心理上卻充滿希望和自信，期待將有一番大作為。八年之後他束裝就道，赴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的時候，其實已經是一位獲得安身立命之地的成熟學者，而非剛剛踏上征途，準備「扎硬寨，打死仗」（何公炳棟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的自況）以求立足的外來客，其心理深層的安穩與後者之緊張委實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他自覺在古史方面游刃有餘，沒有也不需要「在〔導師〕顧立雅先生身上讀甚麼中國東西」即能夠寫出論文（見許公口述、李懷宇撰寫《許倬雲談話錄》），甚至還參與到其時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中去，是順理成章的。

無論如何，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不久，他就踐約返台，隨即接任台大歷史系主任，同時在史語所任職，重新回到以前的穩定軌道上去。此後八年間，他在台灣學術界如魚得水，俯仰自得，行有餘力，更與一批同聲同氣的朋友集會結社，探討、議論時政，雖然經常處於政府強大壓力的陰影之下，而為此擔驚受怕，卻從來不缺乏師友同儕的鼓勵、支持與照顧。在不惑之年赴匹茲堡大學訪問時，他已經是一位地位穩固的資深教授，其後決定逗留不歸，顯然也很順當地便獲得了長聘教席。統而言之，上天好像是要補償許公生來殘缺之憾，為他安排了一條特別安穩暢順的事業道路，使他有充分自信、餘暇乃至衝動去探討、議論專業以外的大問題。這是自進入美國高等學府之始，便必須面對無形但長期持續專業壓力的其他三位學者所絕對無法享受到的寬鬆環境。

其次，西方學術風氣講究專精，學者即使觸類旁通，也大多是為了另闢蹊徑以擴大本專業的範圍，或者以別的專業補其不足，而絕少願意單純為了興趣而不惜浪費精力於其他科目。記得英時兄曾經把做學問比作下棋，而有「高手無廢子」之語，那多少也就是這個意思吧。然而，許公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那五年之中，卻以大部分時間游心於韋伯理論、兩河與埃及古代史、歐洲中古社會，乃至啟蒙運動等西方社會學與史學問題。到了匹大之後，由於歷史系的覆蓋面廣，而且社會科學背景很強，所以他在文化學、宗教學、社會學、西方史學交的朋友特別多，雖然聚散無常，但「大家已不再聚會。可是，我一直還在這些課題上打轉」（俱見前引《許倬雲談話錄》）。所以，既由個人興趣，也是因緣際會，許公的學養背景要比其他三位開拓得更為寬廣，這自然為他從中國歷史轉向世界史和當代世界評論鋪平道路，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種向其他領域拓展的強大吸引力。而其他三位史家，包括對於

韋伯學說、軸心時代、巫文化等理論有深刻研究的英時兄，則顯然都沒有他那樣廣泛的興趣——再打個比方，在黑白方圓世界之中，他當屬宇宙流無疑！

許公放眼中外，盱衡古今，這種豪邁氣概是否和上面所提出來的兩個原因有關，自是見仁見智，不易確定，也難以深究。另一方面，即使將他80年代初的重要專著《西周史》和晚年力作《萬古江河》相比較，也可以見到兩書出版雖然相距二十多年，其核心精神則一仍舊貫，只不過前者追求嚴謹細密，着重湮遠古史的考證與分析，後者則宏觀流暢，以抒發對中國歷史整體的見解為主，但底子裏兩者都屬通史性質。它們與錢穆夫子的《國史大綱》類型不同，精神則相通，與何公《東方的搖籃》、光直兄《中國青銅時代》、英時兄《朱熹的歷史世界》等著作則迥然而異。其分野就在於：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後者則無論其篇幅規模如何，卻始終是環繞特定問題而展開，其有限度目標即在於解決此具體問題。從此看來，僑居西方大半輩子的許公，心底裏嚮往的仍然是司馬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種境界，並以此為最高理想，這是以上三位史學家所早已經有意或者不知不覺中放棄了的（見英時兄口述、李懷宇整理《余英時談話錄》論「通史」部分）。那麼，他之所以能夠不受西方學術大環境影響而堅持發揮這個理念，恐怕和上面提出來的原因也不無關係吧？

在90年代初許公應邀來港出任中大「偉倫講座教授」並訪問歷史系數年。當時我忙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內工作，特別是推動《二十一世紀》的發展，竟沒有趁此良機認真向他請教，可謂失之交臂。其實，那時我正對不同文明在西方衝擊下所作反應的比較發生濃厚興趣，有一趟發表關於土耳其現代化歷程的長文，蒙許公惠然嘉許，我生性魯鈍，不懂得積極回應，回想起來委實慚愧之至。

歲月匆匆，如今世界大國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已經由暗轉明，從無硝烟演變為（即使是間接的）兵戎相見了，其錯綜複雜程度以及範圍（無論就地理抑或性質而言）之廣，都是人類歷史上所從未夢見，而至終將伊于胡底，則更非任何人所能夠想像——在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戰爭方興未艾之際，有識之士如博丹（Jean Bodin）、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等輩，想當亦曾生出相類似的迷茫之感吧！處此滔滔世變，許公雖年逾耄耋，但頭腦清晰，意志頑強，在夫人悉心呵護下，身體也仍然朗健，實可喜可賀。正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深信，他必然能夠不負上天之託，以同樣堅強的精神邁向期頤，繼續為我們論列瞬息萬變的世界，是為祝為禱。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